

阎宗临与法国汉学

张 炜

【提要】 在阎宗临颇为广泛的治学范围中,尤以在中西交通史领域取得的成就最大,这主要得益于其与法国汉学之间深厚的渊源关系。阎宗临早岁在法语学术界的受教育经历,为其接受法国汉学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环境。他的相关著述不但触及了法国汉学的主流,而且其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亦或研究主题和思路,都与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界存在着紧密联系。其开拓的研究领域及学术观点和方法,也在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汉学界得到了回响。阎宗临在充分把握法国汉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跨文化的角度开辟新说的做法,凸显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做出独特贡献的一种可能性路径。

【关键词】 阎宗临 法国汉学 中西交通史

阎宗临(1904—1978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一位重要学者。他治学的范围很广,涉及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欧洲史、古籍笺注等诸多方面,其中尤以中西交通史的成就最大。特别是他关于明清时期基督教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被学界认为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①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阎宗临学术思想的论述已有多篇^②。但与此同时,尚缺少从域外学术的视角对其著述予以审视的研究。事实上,由于阎宗临早岁留学瑞士的学术经历,使他与法语学术界,特别是法国汉学界存在着极为深厚的渊源关系。有鉴于此,分析梳理阎宗临与法国汉学的关系,或可从更加广阔的学术史角度对其学术成就进行适当定位,并可从中得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做出独特贡献的点滴心得。同时,此项研究亦可加深学术界对民国学人与域外汉学关系的认识。

①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齐世荣序”第3页。

② 师道刚最早(1982年)对阎宗临的学术生涯做了总括性介绍,后又于1996年发表单篇介绍性文章。参见师道刚《阎宗临先生传略》,《山西文史资料》1996年第5期,第33—45页。2000年后,相继有数位学者以论文形式对阎宗临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成绩做了系统梳理,如黄春高《史业今生未许休——阎宗临先生的文化史论略》,《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24—29页;张炜《阎宗临和他的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2—131页;陈德正、郭小凌《阎宗临的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古代文明》2010年第3期,第2—9页;王荣声、王玉声《阎宗临与他的文化史观》,《山西档案》2010年第6期,第51—55页;张炜《抗战时期跨文化知识分子的文化抗敌活动及其文化思想——以阎宗临和蒋彝为中心》,载李建平、张中良主编《抗战文化研究》(第九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9页等。计翔翔、朱幼棣、散木、张西平、谢方、维舟、高毅、宋晓芹、王三义、张炜、陈德正等人相继发表了有关其著述的书评文章。另外,廖久明的《亲如兄弟:高长虹与阎宗临》(《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3—136页),以及散木的《阎宗临与鲁迅及其他》(上)(《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第1期,第123—143页)、《阎宗临与鲁迅及其他》(中)(《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第2期,第144—156页)、《阎宗临与鲁迅及其他》(下)(《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4—115页)则是对阎宗临与20世纪中国文化界人士交往历史的细致梳理。关于阎宗临的学术生平,迄今为止研究最为全面深入的当属阎守诚所著《阎宗临传》,三晋出版社2014年版。

一、求法西学的缘由及其学术成绩

法国汉学作为西方汉学的一支,虽然是以中国为其研究的内容,但理论的框架、文献背后的解释方法都是西方的,所以是西学的一部分。^① 阎宗临的学术之路之所以能够与之发生紧密联系,是其个人早年所受社会思潮和鲁迅等人的影响,以及留学所在学校的性质与个人信仰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阎宗临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及鲁迅等人的强烈影响。1919年春,他入读由阎锡山建立的私立川至中学。此时正是五四运动即将在全国轰轰烈烈爆发之际,而新文化运动之风也早已吹至该校。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如用白话文写作、反对封建礼教等,通过学校的年轻教师和大量进步报刊,对青年学生有很大影响。^② 当时,阎宗临尚为15岁的少年,极容易接受新思想。因此,这一社会思潮对其个人思想的发展打下了浓重的底色。1924年,阎宗临因参与驱赶校长风潮而被所在中学开除,于当年8月来到北京。在《国风日报》工作期间,他参与了由高长虹创立的文学社团狂飙社的活动。由高长虹引见,阎宗临与鲁迅也在1925至1926年有过多次交往。^③ 鲁迅热情鼓励青年人要多读外国书,多接触现实生活。^④ 受其教诲,“读洋书”成了阎宗临青年时代的理想。1925年冬,他在友人帮助下赴法勤工俭学。据阎宗临后来回忆,这个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先生的影响。”^⑤

其次,阎宗临在瑞士弗里堡(Fribourg)接受了天主教大学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并皈依天主教,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取向。阎宗临在法国经历了近四年的勤工俭学生活后,于1929年正式入读瑞士弗里堡大学。弗里堡位于瑞士西南部,其居民的宗教信仰主要为天主教,是瑞士天主教的重镇。坐落于此的弗里堡大学始建于1889年,在20世纪20、30年代是瑞士11所公立高等学府之一,^⑥也是唯一一所天主教大学。^⑦ 当时,该校规模不大,但因汇聚世界各国文化的理念而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⑧ 进入该校学习后,他的日常生活受到一个具有慈善性质的天主教团体——圣·宇思丹(St Justin)的资助,大学内的教授也多为天主教神职人员。受此环境的潜移默化影响,阎宗临在1931年12月27日接受了洗礼,正式皈依天主教。^⑨

在此背景下,他逐渐将研究目光聚焦于历史上的天主教会及耶稣会士,尤其关注其与中国的宗

① 张西平:《汉学研究三题》,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九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② 阎守诚:《阎宗临传》,三晋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③ 鲁迅的日记中多次记录与阎宗临的交往,如1925年2月8日日记载“午后长虹、春台、阎宗临来。”1925年3月9日日记载“阎宗临、长虹来并赠《精神与爱的女神》二本,赠以《苦征》各一本。”1925年6月16日日记载“长虹、已燃(阎宗临笔名之一——引者注)来。”1925年9月5日日记载“已燃、长虹来。”1926年8月17日日记载“上午分寄盐谷节山、章锡箴、阎宗临书籍。”参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日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3、537、550、561、612页。

④ 阎守诚:《阎宗临传》,第33页。

⑤ 阎宗临:《回忆罗曼·罗兰谈鲁迅》,《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第2页。

⑥ 张维邦:《瑞士史》,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19页。

⑦ 阎守诚:《阎宗临传》,第43页。

⑧ Jean-Pierre Meylan, 阎宗临 Yian Tsouan Lin, “l’écivain Lu Xun et Romain Rolland: Les péripéties d’un étudiant chinois en Suisse et à Shanghai (1929 - 1937)”, *Cahiers de Brèves*, Numéro 25 - juillet 2010. Association Romain Rolland. pp. 35 - 36. 弗里堡大学中外留学生在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高。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下半叶,如1980—1981年外国留学生在法语大学注册数占瑞士全国的54%。作为双语(法语和德语)大学的弗里堡大学外国留学生又占9%。参见张维邦《瑞士史》,第118页。

⑨ 阎守诚:《阎宗临传》,第52页。

教文化关系,这正是法国汉学家数百年来矢志探讨的主题。在1933年为获得硕士学位而参加古代及中世纪史高级证书考试时,阎宗临提交的笔试文章为《13世纪到14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主要探讨罗马教廷与中国元朝发生的早期联系。^①这是他真正开启学术研究的起点。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阎宗临又以《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为题,着重对耶稣会士在17、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细密的研究,并以法文在瑞士出版。^②1937年回国任教后,他继续在此领域钻研进取,先后发表《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建设研究》第5卷第2期,1940年)、《中国文化西渐之一页——17世纪末中法文化之关系与18世纪之重农学派》(《建设研究》第5卷第5期,1941年)、《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建设研究》第6卷第2期,1941年)、《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建设研究》第6卷第3期,1941年)、《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之使节》(昆明《益世报·宗教与文化》第35—40期,1943年)等一系列论文。同时,他还在1941年的《扫荡报》副刊《文史地》上连载了《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等16篇文章。另外,他重点关注《身见录》等涉及中外交往的古代典籍,先后发表了《〈身见录〉校注》(最早刊于1941年的《扫荡报》副刊《文史地》第52—53期)等文章。通过这些成果,阎宗临在中文学术界初步树起了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一种文化范式。

在1949年后,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发生了巨大转变。他更加注重从唯物史观出发,加强了对经济基础、社会形态、阶级斗争等因素在中西互动交流中所起作用的论述。在此期间他发表或完成的著述如论文《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2期),古籍笺注如《〈北使记〉笺注》、《〈西使记〉笺注》(均发表于《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佛国记〉笺注》(1965年未刊稿)等即是典型代表。综观其学术生涯前期与后期的中西交通史相关论著,我们发现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共同点,即是对法国汉学的密切关注。

二、阎宗临重点关注的法国汉学著述

阎宗临开始接触法国汉学应是在瑞士弗里堡大学正式接受高等教育之际,但法国汉学著述真正在其研究中得以明确体现,则是在他1936年至1965年间完成的十数篇有关中西交通史的论著中。我们这里对阎宗临重点提及、征引法国汉学著述情形所做的考索主要依靠内证,即通过审读其著述正文及注释内容取证。^③阎宗临代表性论著中重点关注的法国汉学家及其著述,^④见表1。

为了分析阎宗临论著中所提及和征引的法国汉学家及其著述是否具有一定权威性,即是否体现出法国汉学界的主流研究水平,我们撷取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法国汉学学术史著述,列举出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20世纪中期以前的法国汉学家人名,与阎著中的法国汉学家做一对比,见表2。

① 阎守诚《阎宗临传》,第50页。

② Yian Tsouan-Lin, *Essai sur le P. Du Halde et sa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Fraguère frères, 1937.

③ 该方法参见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86页。

④ 因阎著中征引的法国汉学著述及汉学家数量较多,此处所谓“代表性”指文章既能体现其学术最高水平,而且具备相对标准的引文规范。“重点”即指在其每篇著述中至少提及两次。

表1 阎著重点关注的法国汉学家及其著述

阎宗临的代表性论著	重点提及和征引的法国汉学家及其著述
《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	杜赫德《中国帝国全志》 ^① 、毕诺(Virgile Pino)《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② 、《重农主义者和18世纪的中国》、裴化行(Henri-Bernard Maître)《鄂本笃修士在东亚的穆斯林人中(1903—1907年)》 ^③ 、考狄(Henri Cordier)《18世纪中国研究史片段》、《18世纪的中国在法国》、《西洋人论中国书目》、《可以补充远东教会史的未发表之文献》、《耶稣会被取消和北京传教团》 ^④ 、李明(Louis Lecointe)《中国现势新志》 ^⑤ 、德·拉·塞尔维耶尔(De la Serviere)《一部新作中的汤若望神甫》、白晋(J. Bouvet)《中国皇帝康熙传》、德莫朗(G. S. de Moran)《法国耶稣会在中国的业绩》、戴遂良(Léon Wiegier) ^⑥ 、隋葛驼(Suoeco Got)《现代远东和西方最初的文化交流》、丁兆庆《1650—1750年间法国人对中国的描述》 ^⑦ 、张诚(J. -F. Gerbillon)、普梯埃(G. Pauthie)《东方经书》、杜密里(A. Dumeril)《耶稣会士对18世纪思想运动的影响》 ^⑧ 、冯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中国通史》 ^⑨ 、布鲁凯尔(S. Brucker)《18世纪传教士绘制中国地图书简集》、布鲁(A. Brou)《北京的耶稣会士汉学家和巴黎的出版社》、马尔蒂诺(Pierre Martin)《17、18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东方》、钱德明(Joseph Amiot)《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的回忆》
《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	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李明《中国现势新志》、德莫朗《法国耶稣会在中国的业绩》、马尔蒂诺《17、18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东方》
《中国文化西渐之一页——17世纪末中法文化之关系与18世纪之重农学派》	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重农主义者和18世纪的中国》、考狄《18世纪的中国在法国》、宋君荣(Antoine Gaubil)《中国天文学史》
《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	白晋《中国皇帝康熙传》、杜赫德《中国帝国全志》、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隋葛驼《现代远东和西方最初的文化交流》
《〈身见录〉校注》	费赖之(Louis Pfister)《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沙畹(Edouard Chavannes)《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资料来源: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阎宗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对比表1和表2中的法国汉学家及其著作可以发现, 阎宗临在其论著中所提及和征引的学者及其著作与法国汉学界公认的汉学名家的重合度很高, 说明他的著作完全触及到了法国汉学的主流。不论是17、18世纪法国汉学肇兴之际的代表性人物(如张诚、白晋), 还是20世纪上半叶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阎著中都有所涉及。值得一提的是, 在20世纪初期法国汉学界出现了一股关注17、18世纪法国“中国热”现象的研究热潮, 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颇具学术开创性的论著, 如H. 贝勒维奇—斯坦

① 阎著译名为《中华帝国志》。为了表述与阅读方便起见, 本文涉及阎著与今译译名不统一时, 正文采用今译, 脚注中会注明阎著译名, 下同。

② 阎著译名为《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之形成》。

③ 阎著译名为《鄂本笃兄弟在上亚洲的穆斯林中》。

④ 阎著译名为高田, 第二部书名为《中国在18世纪的法国》, 第三部书名为《中国书目》。

⑤ 阎著译名为《中国现状新志》。

⑥ 阎著译名为雷昂·维埃瑞。

⑦ 阎著译名为金绍清, 书名为《1650—1750年间法国人笔下的中国》。

⑧ 阎著又译杜麦里尔。

⑨ 阎著译名为《中国史》。

科维奇(H. Belevitch-Stankevitch)的论文《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中国情趣》(1910年)等。^① 此类论著在阎宗临的相关论述中都有明确体现。又如,法国华裔学者丁兆庆在1928年出版了《1650—1750年间法国人对中国的描述》一书,并由当时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马伯乐作序,是20世纪法国华裔学者中最早的一批汉学研究成果之一。该书从各种法国著作中较为详细地辑录了1650—1750年间法国的传教士、政界人物、商人、神学家、旅行家、航海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哲学家)们论述中国的言论,实际上是对当时那场“中国热”风潮的一种全面再现。^② 阎宗临在其《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中多次引用该书,说明他已经关注到了该研究动向。因此,我们可以说阎宗临对法国汉学研究成果的掌握是全面而及时的,亦可说他的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这一主流学术潮流的接续。

表2 法国汉学史上的重要汉学家

法国汉学学术史论著	重点提及的法国汉学家
若瑟·佛莱什《从法国汉学到国际汉学》	张诚、白晋、李明、杜赫德、钱德明、冯秉正、戴遂良、尼古拉·弗雷烈(Nicolas Fréret)、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③ 、老德经、雷慕沙(Abel Rémusat)、儒莲(Stanislas Julien)、德理文、沙畹、考狄、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éro)、葛兰言(Marcel Granet)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	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冯秉正、宋君荣、钱德明、雷慕沙、儒莲、德理文、毕瓿(Edouard Biot)、沙畹、考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
詹嘉玲《法国对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	李明、裴化行、荣振华、安田朴、谢和耐、迪代伊、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毕梅雪(Michèle Pirazzoli-t' Serstevens)、费赖之

资料来源:耿昇《中法文化交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戴仁编《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耿昇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三、阎宗临与法国汉学的关系

对于阎宗临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过程中与法国汉学界发生的紧密联系,我们不光要从量的方面予以考察,而且还需从质的层面进行研究。笔者认为或可从如下几方面进一步加深对此问题的理解。

首先,法国汉学家及其著述本身即是阎宗临的研究对象,而他本人在西方教育体制中也近乎于一名汉学家。前文已述,阎宗临的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是他有关明清时期基督教与中国关系研究的出发点与生长点。在其后多篇论著中,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这一重要的汉学家及其著作。因此,对于一名以法国汉学学术史为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诸多法国汉学家的著述本身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并构成其研究的基本资料,这是与法国汉学形成紧密联系的首要前提。

其次,法国汉学家的著作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方面对阎宗临产生了巨大的引导作用。其中,像雷慕沙、毕诺等人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雷慕沙(1788—1832年)是第一位在法兰西学院执掌汉学讲席的教授。在其学术生涯后期,雷慕沙对法显《佛国记》进行了开拓性研究,1836年以《法显撰〈佛国记〉》为题出版了一部译注本。该译注本荟萃了大量内容丰富而精辟的考证,并体现出19世纪法国汉学研究

①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②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③ 阎著译名为富尔蒙。

的一种倾向:即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乃至全世界其余地区的关系来考虑中国,去发掘有关世界史的汉文资料。^① 阎宗临从1941年开始,即以对樊守义所作《身见录》做校注的方式,发表了相关文章。1949年后,在国内世界史研究资料短缺的情形下,他继又对刘祁《北使记》和刘郁《西使记》做了笺注。在1965年还完成了《〈佛国记〉笺注》一文,以在中文资料中开掘对世界史研究有益的资料价值。在《〈西使记〉笺注》的“绪言”部分,他特别指出:“道光五年(1825年),法人雷慕沙(将《西使记》)译为法文……对研究中古中亚史是有积极意义的。”^②在《〈佛国记〉笺注》的“后记”部分,他再次提到:“从1836年,雷慕沙译《佛国记》为法文后,外人译注者相继辈出……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与研究。”^③可见,其相关研究受雷慕沙思想方法之影响是贯穿于其学术生涯始终的。

另一位对阎宗临研究方法影响很大的学者为维吉尔·毕诺。阎宗临在《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一文的起始部分就表明“我们曾受益于很多先前的作品,特别是皮诺特(即毕诺——引者注)先生、陈垣先生的著作。”^④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这部近十万字的博士论文中,阎宗临明确提及毕诺及其著述者就多达26处,尤其是毕诺的著作《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以下简称“毕诺书”)被引用次数最多。在毕诺书第一编第六章“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毕诺强调这些著作是法国认识中国以及中国在哲学方面影响法国的基本资料,是中学西渐的渠道和手段。^⑤这应该是引导阎宗临选择聚焦耶稣会士作品的指针。而在第二编第二章“中国人的哲学和宗教”及第三章“中国人的伦理和政治”中,毕诺指出中学对欧洲影响最多的正是哲学、宗教、伦理和政治。^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阎著观察中学西渐问题的视角。特别是阎著学术价值最高的有关耶稣会士作品对启蒙思想家产生影响的部分,阎宗临也指出其立论基础遵循了毕诺的思想。毕诺认为,观察农村情况是评判一个国家治理好坏的“简单标准”,所以阎著据此引出了魁奈对中国专制主义治理大加褒扬的论述。^⑦

再次,他的研究对法国汉学界的诸多观点提出了质疑,努力开辟了新说。虽然毕诺对其影响甚巨,但阎宗临也通过相对更擅长的中国史料,对毕诺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譬如,毕诺认为,耶稣会士们充满对中国精神进行赞美的渴望,是由于中国人给数学、天文学……带来热爱和尊敬,然而事实并非如他们异想天开的那样美好。对于这一低估中国人欢迎耶稣会士程度的看法,阎宗临援引《明史》里的相关记载指出:“当时中国非天主教学者们认为,来自西方的文人是些教养很高的人。他们不在乎名誉,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使命。他们著作中所论之事我们尚不知道。有些好奇的人爱和他们联系……相当多的人,除了皇帝以外,都和这些文人有了联系。”^⑧这便肯定了耶稣会士在中国非天主教徒中的受欢迎情形。

此外,阎宗临对于沙畹这位被誉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方世界汉学研究大师”的某些论断也提出过质疑。例如,阎宗临在《〈佛国记〉笺注》中探讨传述中佛祖舍身喂虎的地点时,根据法显所描述的方位,认为沙畹在释《宋云行纪》中所认为的“应在mahaban中寻之”是不可能的。^⑨

如果说上述两例还仅局限于他对法国汉学家个别论点有所质疑的话,那么另有一例或可说明阎宗

① 戴仁编《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第22—23页;耿昇《中法文化交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②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207页。

③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274—275页。

④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278页。

⑤ 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7—210页。

⑥ 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320—497页。

⑦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365—367页。

⑧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297页。

⑨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232页。

临的质疑已经触及了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这便是对戴遂良观点的反驳。在以域外汉学家的角度研究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后,戴遂良曾保证说:“中国的过去,对于我们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而阎宗临从一名中国研究者的角度指出:“这纯粹是无知的傲慢。因为真实的中国,我是说它的灵魂与文化,还尚未被欧洲所认识。”^①所以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耶稣会士们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但仍然有必要对其描述中国内容的准确性、客观性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便凸显出中国学者更加熟悉中国情形的优势。也正是基于此点,阎宗临对《中华帝国全志》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从兼通中西的有利位置予以观察,给予了一定的正面肯定。^②这个结论的分量是很多不具有亲历中国的经验或不通中文的汉学家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他还强调,该书的成书及影响过程乃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中法知识分子合作史之一例,^③是对法国汉学界已有观点有见地的补充和完善。

最后,阎著所开辟的研究领域、视角方法以至某些观点,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的法国汉学界获得了回响。就阎宗临用力最深的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研究,法国汉学界在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较长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于2002年出版了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的力作《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该书通过大量文献和考证,勾勒出《中华帝国全志》的成书过程,探究了该书的稿源、选稿标准及对原稿的增删和改动,并查考了书中译文的中文资料来源,比较深入细致地揭示出了《中华帝国全志》与中国经典西传的关系。^④值得一提的是,蓝莉在梳理有关《中华帝国全志》的研究史时,曾专门提到阎宗临在瑞士出版的相关著作,并作为“当代著作”将其列于参考书目中。^⑤这表明阎著在法国汉学界的研究地位是受到关注的。蓝莉正是基于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杜赫德书进行了更具考证性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阎宗临具备比较宏观的社会史视野,没有局限于“一人一书”的窠臼中。例如当他探讨传教士西来的情况时,便结合明清鼎革之际中国社会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以较为宏阔的笔调勾勒了耶稣会士到来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以及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影响。这一点与20世纪下半叶法国的重要汉学家如谢和耐等人的研究方法是相近的。在谢和耐的汉学研究生涯里,他主要是以中国社会史的大学科为中心展开的,因此便会特别关注明清之际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大变迁的同步性,而他认为耶稣会士正好适得其时地充当了中西交流与撞击的媒介。^⑥这是对阎著中有关视角和观点的更为全面的表述。

在研究观点上,阎宗临相关论著的一大论点即认为,以魁奈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感兴趣的并不是中国本身,而是为他们自己的理论观点找依据。^⑦这一点在数十年后也得到了诸如安田朴等法国汉学家的回响。安田朴在1988年至198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中即指出,“中国热”风潮完全是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误解和本国需要为基础的,那些欧洲思想家们更多关心的是如何利用中国为他们的政治哲学增光或作为陪衬。^⑧可见,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两位学者的观

①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277页。

②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338页。

③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370页。

④ 蓝莉《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⑤ 蓝莉《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第7、427页。

⑥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昇《法国汉学界对于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代重版序)第vi页。

⑦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362页。

⑧ 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点几乎同出一辙。不可否认,这些回响都从某些侧面印证了阎著在法国汉学发展中的一些先见之明之处。

结语 以跨文化视角会通中西

综上所述,阎宗临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其与法国汉学之间极为紧密的联系。他正是在充分了解和吸收当时法国汉学界主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学者对中国史料和现状情况相对更为了解的优势中,找到了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立论视角,形成了将文化交流视为历史演进重要推动力的论述体系,提出了诸多值得重视的观点。因此,他的研究构成了法国汉学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同时,其在中文学界发表的成果,又将法国汉学界的最新研究动向介绍而来,在中文学术界初步树起了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一种文化范式,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加速了中国相关研究的现代转型。在其与法国汉学的互动中,阎宗临正是善于“从跨文化的角度,在比较文化的层面上对其(海外汉学——引者注)审视和吸收,展开交流与对话”^①,才取得了上述成绩。实际上,这也正是当前中国学人在国际学术界做出独特贡献的一种可能性方法。

当然,阎宗临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缺憾,否则应会在法国汉学学术史上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譬如在他学术生涯的前期(20世纪30年代),由于对清前期中外关系史的知识储备略显不足,阎宗临对罗马传信部所藏这一时期中国诸皇帝与耶稣会士关系的档案文件只是做了简单叙述,并没有做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再如学者蓝莉所指出的,阎宗临在对《中华帝国全志》的研究中,并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中文优势,未对杜赫德的供稿人如何利用原文资料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②这或许亦可说明,中国学者要想在此类研究领域做出更加精深的研究,其在中国历史、语言、文化方面的学养往往是更具决定性的要素。但无论如何,阎宗临与法国汉学的这种有机联系,当可为学术界有关20世纪中前期中国学人与域外汉学关系的研究^③提供一种关系紧密类型的例证。

(作者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006)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张文涛)

① 张西平:《汉学研究三题》,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九辑),第13页。

② 蓝莉:《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第8页。

③ 近年来这一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代表性成果有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孝迁《民国时期国际汉学史研究》,《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十七辑——“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9—420页;李孝迁《“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76—83页;韦磊《20世纪上半叶民国学界对国外汉学的关注》,张西平主编《国际汉学》(夏之卷),总第7期,2016年版,第171—179页等。

Back to State Building: An Analysis of the Qing Imperial Policy and the Study of New Qing History
//Liu Wenpeng

Having applied imperialism theories in studying Qing history, Peter Perdue and other scholars of the “New Qing History” School put forth the notion of “Manchu imperialism” to describe the Qing dynasty’s policy toward Inner Asia,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the School. These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the Qing empire’s expansion into Inner Asia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was comparable to the colonialist policies of the Ottoman and European empires. However, having built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Wester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this viewpoint carries an ideological overtone and contains serious logical and historical flaws. We need to criticize it and study the Qing once ag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building. We should not be misguided by erroneous theories; instead we should adopt a comprehensive and histor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Qing political history diachron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1911 – 49): A Case Study of Xia Nai’s (1910 – 85) Early Career *//Wang Xing*

Based on the reading of Xia Nai’s diary as well as readings of other relevant sourc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by looking at Xia’s early career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At first, Xia Nai regarded archaeology as an inferior form of scholarship. But later he changed his mind and believed instead that archaeology was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hina. This reversal of mind in Xia Nai reflected his early academic experience. It was also related to the overall academic atmosphere in the Republican era. With respect to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al and historical periods,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bviously play a different role. Howev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essential to the study of archaeology too. Indeed, while their approaches are different,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both seek to understand and reconstruct the ancient past. Studying Xia Nai’s 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helps u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ship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t also improves our knowledge of how the two disciplines developed further during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period.

Yan Zonglin (1904 – 1978) and French Sinology *//Zhang Wei*

As a prominent historian in modern China, Yan Zonglin is well known for his broad knowledge. Yet it i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Sino-European relations that he made the most notable achievement. This achievement was related to Yan’s study in France where he developed a keen interest in French sinology. Indeed, thanks to his French education and his proficiency in the language, Yan was well prepared for making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French sinologists. With respect to subjects of study, research methods and source materials, his early writings in the study of Sino-European relations reflect his solid training as well as the mainstream interest in French sinology of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His publications also became well received among French sinologists. Having acquainted himself wel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sinology, Yan made a unique scholarly contribution, one that demonstrates a cross-cultural characteristic. His career and accomplishment are truly exemplary.

“China-centered Approach” and the China Studies in the U. S. *//Wang Rui*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advocated and advanced by Paul A. Cohen has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Yet previous studies tend to only focus on the approach itself and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s such, they have not yielded very satisfactory result. In fact, the author contends, the rise of this “China-centered approach”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a much larger context. Indeed, if there was not a general trend of critical reflection of academic studies in the U. S. and John K. Fairbank’s support, Paul Cohen and his associates might not be able to put forth their theory. At least,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might not have had such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While it helped modify the previous “challenge and response approach” and pointed to a new direc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U. S., the theory itself was far from perfect. It has its theoretical weaknesses as well as some limits in application.